当今拉美：全球化抑或其他选择

[古巴]阿达尔贝托·龙达·巴罗纳

编者按 2005年9月19~22日，古巴科技部与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中古社会科学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会议期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与古巴科技部代表团举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前景分析”专题讨论会。古共中央美洲研究中心主任阿达尔贝托·龙达·巴罗纳在题为《当今拉美：全球化抑或其他选择》的论文中，就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对“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和其他选择、拉美不同性质的一体化进程等进行了分析。文中列举的大量数据和事实，有助于对拉美经济社会现状及前景的了解。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与社会经济本质的内在需求产生了多种冲突、矛盾以及不平等。从当前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看，自由贸易和加速的全球化趋势并未确切地获得胜利；从目前拉丁美洲的情况看，可以推断出在全球化进程下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和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然”结局就是剥削、社会产品的集中和不公平分配。

一 拉美地区新自由主义和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失败

全球化在拉美地区导致的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有。在其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该地区没能有效地提升生产结构以吸收技术革命的进步，因此也就没有进入动态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并拥有足够的自主决定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现存的资本主义而言，当面临着新自由资本主义和现存的资本主义的压力时候，为了解决依附性发展和一体化问题，唯一答案就是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范式。在该范式的指导下，拉美地区进行了 20 多年的改革。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拉美国家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体系和利率的自由化，方便外来投资，降低公共开支特别是用作社会福利的公共开支，严格履行对外债的偿还承诺，对政府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

按照放松管制、私有化理论和投资学原理，新自由主义竭力宣称，在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结构改革后，重组过于庞大、过多干涉、经济上无效率的政府，拉美地区经济将会增长，民众阶层将会从创造的财富中获得所谓的“滴漏效应”，脱离贫穷和被社会排斥的状况；适合于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会在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并进入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行列。私有化热潮在“华盛顿共识”下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放大、抬高。

在整个 80 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外国直接投资（FDI）基础之上。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从 1990~1994 年，公共部门从 694 家公司的出售中获得了 590 亿美元收入，几乎比所有实行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该项收入 1040 亿美元的一半还多。如果从 1990 年算起，截至 1996 年，824.17 亿美元的私有化收入几乎占实行私有化国家收入的 53%；1997 年和 1998 年，该项收入为 710.58 亿美元，占 61.8%；1999 年，该项收入为 230 亿美元，占 54%。拉美在整个 90 年代的私有化收入占有不发达国家私有化收入的 56%。这些数据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结构性的经济改革中，拉美是新兴市场地区中私有化和国际化比例最高的地区。

但是，该地区来自 FDI 的收入并不意味着流量的增加。截至 1998 年，超过 40% 的 FDI 是来自并购的收入，而这些并购仅仅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并且还主要是流向跨国公司。从格兰德河到麦哲伦海峡，所有国家的真实情况是，公

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多地被改变，大部分国家变得依赖私有经济和国际市场。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原本就脆弱的民主被剥夺，经济自主决定权也被削弱。

但是，按照阿根廷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阿蒂里奥·博隆教授的说法，疯狂的管制放松、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者为其新自由主义政府、满足霸权主义资本家的跨国利益以及满足盟国利益的结果，而不是市场自身独立运行的“中性”结果。因此，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效果更接近于让政府和地区寡头满意，而不是市场“自发且不受控制的力量”所导致的结果。如果没有政府积极的政治干预，跨国公司不会扩张得如此之快，而这些干预从新自由主义试验开始就一直存在。正如阿根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全球化的实现，而在于拉美国家的政府面对挑战的反应。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主要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面对霸权时的软弱。

尽管宏观经济数据有所好转，如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但经过 20 年的包括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等内容的完全不对等的对外开放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给拉美的却是十分糟糕的结果。该地区严重的社会经济现实状况并不能令“华盛顿共识”的“改良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满意。对照实际情况，已经实行的政策和“滴漏效应”神话都是不合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得拉美在经济上逐渐形成对国外的依赖，支柱产业得不到发展，无休止的外债压力，经济根本停滞，无休止地要求调整，要求私有化。拉美成为一个被剥削、贫穷、失业、急速的财富两极化、社会边缘化、社会分化所毁坏的次大陆。

经济的均衡增长也令人失望。拉丁美洲从更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市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但国民生产总值（GNP）却并未相应增长。20 世纪 60 年代该地区的 GNP 增速为 5.7%，70 年代为 5.6%，80 年代却只有 1%，90 年代只有 3.3%。

80年代该地区人口增速为2%，这就意味着在这十年中大约每年的人均GNP要降低0.3%，因此称为“失去的十年”也就不为过。在90年代的十年中，伴随着人口增长率的缓降，人均GNP增速也就达到较缓的年均1.7%。因为1.7%是个正数，所以它大致等同于二战后至70年代中期危机之前30多年平均增速的一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诊断，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有着不可治愈的缺陷并导致这一地区陷入停滞和瘫痪状态。紧接着“失去的十年”的是从1998年到2003年的“失去的六年”，这一时期延续了该地区不成功的经济发展趋势。受惠于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的2004年，拉丁美洲的GNP增速达到5.5%，但仍然低于60年代的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拉美地区若要摆脱经济停滞的危机，恰当的办法就是要保持一定时期至少是6%的可持续增长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这一观点值得我们记住。当然，拉美的经济不能够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因为它缺乏国内资本的足够积累以及“补贴的出口奇迹”与资本反方向流出的不对称关系。2004年，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了44%，流入拉美的外资为56.4亿美元，但同年流回北美地区债权方的资金却高达960亿美元。

新自由主义平庸经济表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GNP增速和贸易平衡之间的结构被破坏，或说GNP增速和资本净流出量之间的结构被破坏。一方面，按照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的计算，1982~1985年，拉美向外国支付了1500亿美元的利息，与此同时从这些外资中获得的净收益只有400亿美元。两者之间1100亿美元的差额需要用贸易盈余来弥补，这几乎等于该地区1/3的出口和50%的净储蓄。这些流出国境的资源导致了国内资本的紧缺，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准，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取消第三世界债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克·托萨恩特指出，在1982~2000年间，拉美偿还外债利息高达1.452万亿美元，是全部外债的4倍还多。1982年达到了3332亿美元的最高峰。但是，

债务还在持续增长并于 2004 年达到天文数字 7230 亿美元。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不能偿还债务并认为债务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原因。债务还是勒索与控制拉美的工具，阻碍了拉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自二战结束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统治的年代里，拉丁美洲的贫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推动者把这些成本当作短期成本，社会问题自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扩大到惊人的范围。虽然存在这些事实，世界银行还是宣称收入的分配有了微小的进步。按照 1960 年的数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51% 的居民，也就是 1.1 亿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而 70 年代这一数据曾降到 40%。拉美经委会却宣布：“贫穷人口的数量从 1980 年的 1.359 亿（其中包括 6240 万赤贫人口）增加到 1994 年的 2.093 亿（其中包括 9830 万的赤贫人口）。在这一时期，贫困人口的数量增加了 7340 万。”许多年过去了，数据还是令人吃惊，如在 2003 年下降了 44.3% 基础上的 2004 年，贫困人口仍然达 2.22 亿，占拉美人口的一半。该地区儿童的 60% 也包括在贫困人口中，5300 万的人口仍然面临饥饿的威胁，4200 万的人口仍然是文盲。

如果在 200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认为要达到千年发展目标，即到 2015 年把平均每天收入低于 1 美元的人口降低一半对拉美而言仅仅是个很大的挑战，那么，现在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认为那几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几乎一切迹象都表明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拉美将会持续其最大的特点，即社会不公。在拉美许多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拥有的财富是人均收入最低的 40% 人口的 20 倍还多。

与经济萧条和贫穷最相关的是失业和非正规就业。结构调整导致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失业率升高，社会不安全感增大。从 1980~2003 年的 20 多年里，拉美国家失业率长期上升。债务危机中的 1983 年

失业水平上升了 8.4%，墨西哥比索贬值后的 1996 年达到了最高值 7.9%，而在所谓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又达到了更高值 8.9%。从同一角度来比较，平均失业率在 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分别达到了极高的 9.2%、9.3% 和 10.7%。甚至在该地区经济增速达到 5.5% 的 2004 年，失业率也仅仅是在经济活动人口中下降了 10%。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宣称在未来财富与福利将会通过“滴漏效应”惠及到穷人，而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现实却宣告这一神话已经破灭。正如巴拿马尼尔斯·卡斯特罗教授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现在的贫穷、痛苦、失业、剥削、边缘化、受忽视、毁灭、卫生状况等指标同二战后期、古巴革命开始的时候、古巴游击队时期、萨尔瓦多·阿兰德统治时期做一比较，这个富裕大陆的人民的生活水准是无情地降低了。

新自由主义和依附性资本主义下的当前社会经济状况并非是该地区缺乏发展能力的证据，更不是这些国家所许诺的拥有更高繁荣的天堂景象。社会少数人的财富持续增加和大多数人处于负债和无望境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正是拉美发展模式的结果。危机的结构特点和该模式的缺陷使得社会经济状况难以好转，并阻碍拉美从加速贫困过程中脱离，也使得社会大多数人被边缘化。该特点和缺陷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厄瓜多尔总统总是连续被印第安人运动和平民暴乱所推翻，阿根廷政府不断更迭，玻利维亚发生民众抗议，委内瑞拉发生玻利瓦尔革命。新自由主义民主在经济上缺乏生存力使得拉美人民转而支持非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并寻找其他发展模式。

二 对“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和其他选择：目前的两难困境

对“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有着复杂的概念之争。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者与

“后华盛顿共识”派或第二代改革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另一方面，“后新自由主义社会”、“系统社会”等名词存在概念的界定问题。事实上，次大陆上结构调整的“改革”趋势还在加强，拉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还在进一步演化，出现了一系列回归现象，政策向原有的市民倾斜，政府的社会责任急剧降低，比改革初的社会更加不公正、不公平。在依附性的不发达世界中，“华盛顿共识”下的保守派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者本质上反对改革现存资本主义。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回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尽管面对灾难性的经济和加速增长的社会债务，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和崇拜者仍然拒绝承认其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范式”的失败，反倒辩解其模式的有效性。他们把过错都推到“华盛顿共识”改革在实施时的制度缺失和少数拉美国家无穷无尽的腐败现象上，唯一承认的是结构改革的“社会成本”需要关注，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成本”是由“一部分人承担还是大家都承担”的问题，而不应该“归罪”于新自由主义模式，因为这显然只是短期内的问題，经济好处将会在长期体现出来。

许多分析家所认为的自由化不彻底和实施过程的缺陷仅仅只是新自由主义诸多错误假设的一部分。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说法，低通货膨胀和对财政赤字的严格控制并不能确保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稳定的资本，也不能保证动态的经济增长，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和投资并不能确保产生积极的外部性，企业生产的更高效率和少数有活力部门并不会孕育整体经济的良性循环；经济增长的充分加速需要把政府和其他机构从生产、市场、投资中排斥出去；因为一切都要从属于经济政策，所以缺乏对收入分配和社会政策的关注。

在保守主义的实施过程中以及改革结果出现后，有迹象表明，在 90 年代后半期新古典经济学教条的“公式”开始被重构。从那时起，政治家和学者们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拉美经委会以及其他组织开始

思考并改革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提出推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策略。这个所谓的第二代改革旨在纠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缺陷，从而保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功能上的逻辑性和战略目标的实现；采用跟以前不一样的方法进行改革，希望达到更加人性化的资本主义，保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后华盛顿共识”分明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安全阀，并用来防备可能发生的政府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进程中，第二代改革只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一个自保的办法，而绝非“华盛顿共识”的替代。

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修正的过程中，人们重新认识了增长、贫困和平等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着力于重新评估市场运行中国家所扮演的作用及其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活动表现。第二代改革者不再假设政府处于“中立”的位置，使其甩掉前面所述的经济增长停滞和社会危机恶化的包袱，从而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助于自由贸易发展的环境。从这个观点出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思想家们和实施机构试图通过法律、附属国、劳动力、社会和教育等手段来完善其宏观经济策略。对于改革的效果，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承认，作为实施新社会政策的试验田，次大陆倒是在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领先优势”：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私有化领头羊和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地区。在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改革的先行者就拥有了对抗不平等和贫困（主要是极度贫困）的锐利武器，他们就能够应付其经济政策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按照这种方法，社会政策从属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就有了合理性。

作为辩护新自由主义经济合理性最重要的证明，第二代改革者断言当公共政策和有限的金融资源得到最大可能的高效率应用的时候，需求者就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这意味着要继续推进私有化和普及社会保险，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业规范，引入选择竞争理论和集中优势理论，建立国家对债务的履约责任。

当然，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和政府最小化的思想仍然主导着改革，同时重建相互竞争的思想并彻底放弃全社会团结一致进步的思想。

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推行的方案会缓解部分特定群体的贫困状况，但是这些方案都没有直接解决产生贫困的结构性因素。这些方案仅仅具有辅助性和慈善性的特征，并不能够推动贫困率的持续下降。当该模式开始在这些国家运行后，其有限的正面作用很快崩溃并失去意义。

在为次大陆提供摆脱深度贫困、摆脱边缘化、摆脱社会不公的方法的时候，以及在试图确认是否存在代替新自由主义模式答案的时候，还存在另一个选择：把这些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变化和第二代改革计划结合起来，推进新自由经济的发展。这个选择被“新左派”们所拥护，他们也叫“改革左派”、“温和左派”或者“民主左派”。这些左派的代表在获取政权上台后首先感谢那些备受调整政策负面冲击人们的支持，但他们的初衷并非背离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或采用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范式。从特异性和差异性出发，新温和左派尽管对新自由主义加以修正，但仍优先考虑制度的连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派们的理想目标是更均衡、更公正的资本主义。该资本主义采纳了新古典经济模式的合理性并能缓解对该地区的负面作用。

塔瓦雷·巴斯克斯总统在宣誓就任乌拉圭总统的几天后发表的演说中毫不掩饰地赞美了“新左派”的温和姿态、实用主义，并表现出对民主价值的追随。他说：“如果你问我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政府规划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划，我将会说不是。它是一个民族性的规划，一个民主化的规划，旨在获取社会团结和社会公正，取得经济增长并公平分配，也就是人们都获得发展……我们将要采用乌拉圭式的道路进行改革……它是一个和平、渐进、深思熟虑、严肃、有深度和负责任的改革，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

活，改革旨在提高全体乌拉圭人民的生活质量。从我们被历史性地任命开始，我们就会像阿蒂加斯所说的那样，最需要的就会被最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不允许存在哪怕是最短时间的耽误。”

要真正对社会问题尤其是对贫穷、边缘化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需要分析资本主义剥削、私有化、经济的跨国化及去国家化、农业的被摧毁、资本的外流、对经济和市场的管制放松以及外债等问题。正如德国经济学家汉斯·博查特在他的文章《同贫困的新国际斗争：来自于拉美的视角》中指出的那样，“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都不是典型变革的表述。无论如何，它都是试图通过最佳可行途径来获取市场的优势地位。但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所存在的社会仍然需要政府作为有效的缓冲器来摊销经济调整的成本，尽管其基础是自由主义保守观念。基于相同的原因，目前拉美地区的温和改革计划仍然不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品。

按照“单一”思维者的逻辑，拉美地区的现状证明了所谓的神话，那就是对拉美而言，市场是当前及将来唯一的选择。为证明其原因，前巴西总统费尔南多·H·卡多佐说道：“除了全球化，没有任何出路；选择了全球化，就别无他选。”但是，只需要略微看看刚刚过去的历史和当今的现实，我们会意识到必然性和不可逆性这两个概念其实毫无意义。政府的政策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要么推动，要么平衡缓冲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并不存在不可以更改的政治宿命和经济宿命，而是依赖于社会力量之间的客观关系和其当时社会情况是否允许。阿根廷经济学家阿蒂里奥·博隆断言道：“并不是不存在其他选择，而是缺乏愿意采取行动来终止野蛮行为的政治家，人民大众、左翼力量和民主势力暂时性的式微导致其无法推动其他道路。”

真正能够解决新自由资本主义问题的所有其他道路都会导致其走向对立面

——社会主义。但是，目前社会主义革命理念和力量的退潮还没有被克服。尽管如此，古巴革命仍然继续其胜利的征程，21 世纪所必需的新型社会主义理念已经在拉美地区被唤起。现在的拉美正处于后新自由主义社会重建可能性最大的阶段，如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

三 新自由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一体化

分析拉丁美洲一体化的现状和预测远景，可以发现它包括了不同本质、不同范围的四个动态阶段：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和“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该地区国家参与或退出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以及他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处于谈判阶段或者已经实施）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自由主义的所谓一体化仅仅是地理上的联合，只能加速拉美国家的经济恶化和去国家化，加剧这些国家广大民众面临的社会灾难，使得这些国家对来自北美的跨国公司更为依赖。拉美如果不走“华盛顿共识”的道路，不受绝对自由贸易和跨国公司的欺骗，不丧失经济和政治的自主权，就能够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美洲自由贸易区不应该是该地区一体化的方式。

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不仅仅是贸易协定，它还试图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更深地纳入北美大陆的控制，剥削这些国家更多的劳动力，掠夺更多的石油、天然气、多样化的生物以及水资源。作为唯一的地区性谈判协定，本来应该在 2004 年 1 月签订，却事与愿违。但是，美洲自由贸易区作为一项地区性计划停滞下来并陷入危机，美国仍然在利用其巨大的跨国资本达到其目的。其战略就是在不同的战场推动“竞争性自由化”，主要方法是加速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在这些贸易协定下，美国可以更方便地利用不对称关系来获得重大利益。

美国目前同巴拿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

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智利的双边协定，除了强调“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外，同时内在地联系着多方面的过程。这些过程将有助于帝国主义霸权的存续，打击着力于拉美一体化的次区域一体化。例如，一方面通过这些协议，可以逐步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另一方面又通过加速安第斯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度来推动安第斯共同体的瓦解。

另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基础上的一体化建议是最初由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查韦斯发起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这项建议的目标是要替代主要由美洲自由贸易区领导的次级新自由主义一体化形式，以及替代此前提到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这就意味着，尽管存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及其运作准则仍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但在一体化领域以多种替代方法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是可能的。正如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查韦斯和古巴共和国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2004年12月14日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的目标是改造拉丁美洲的社会，使其更加公正、文明、更具参与性和更加关注团结。正是基于此，“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旨在确保消除社会不公，创造高质量的生活，人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创造自己的命运。

《联合声明》包括几项原则，借以作为委古两国之间目前缔造中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的基础：

商业和投资本身不应是目的，而只是实现良性和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工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真正的一体化既不能漠视市场，也不能成为扩大外部市场或刺激商业的一项简单战略。

针对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应该特殊对待和区别对待。

参加国之间应该谋求经济互补与合作，而不应是国家间以及产品间的竞争，

借此方式可以推动有效而富有竞争力的生产专门化。

针对欠发达国家的特别计划应该强调合作和团结，这些计划应包括美洲大陆扫盲计划，为缺乏医疗保健的公民提供免费保健服务的拉丁美洲计划和区域奖学金计划。

创建由查韦斯总统发起的“社会紧急救助基金”。

整合通讯和运输的发展。

采取行动制订环境保护规范，谋求可持续发展，推动合理利用资源，阻止和我们的民族现实相背离的挥霍性消费模式的扩散。

为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社会的利益，整合区域内各国电力，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

促进拉丁美洲的资本投资。建立拉丁美洲投资基金、南方开发银行和拉丁美洲互助担保机构。捍卫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信息权利，创建南方电视台。采取各种措施建立知识产权规范，以保护区域内各国文化遗产，反对跨国公司的蚕食。

在同其他区域集团和国家的各种谈判过程中以及多边领域中统一立场。

作为一体化的一种替代方案，“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拥有许多特性，这些特性必须加以着重强调。美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阿麦利卡·卢德斯·雷盖罗·贝洛将这些特征罗列如下：

谋求以团结为核心的合作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

承认各国法规和此前各种承诺。

优先发展关键性的社会领域，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

致力于科学研究中的技术转让和知识社会化，反对在当前进行的“典型”协定谈判中排斥这一领域和科学技术高度集中化。

改良互补性。

建立保护价格机制，削弱基础产品价格的脆弱性。

对国家资本给予优惠待遇。

支持积极主动型的国家。

利用补偿贸易机制，追求内生性的融资来源。

利用各种机制和手段保护领土及资源。

总体来看，古巴和委内瑞拉签署的各种计划和协定同“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是一致的。不过，也可以在拉美国家间借助这种构想的新形式来考虑其他协定和谈判。例如：创建“加勒比石油计划”，推动“南方石油计划”和“安第斯石油计划”的谈判进程，所有这些都将是能源一体化作为其主要支柱。这种新形式同样可以运用到阿根廷的一体化合作协定、巴西—委内瑞拉战略联盟、巴拉圭和乌拉圭的能源合作协定中。

（作者简介：古共中央美洲研究中心主任）